

DAXUESHENG YUYAN WENXUE
JIBEN JIAOCHENG

大学生语言文学 基本教程

主 编 王文宏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大学生语言文学基本教程

主 编 王文宏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内 容 简 介

《大学生语言文学基本教程》在总结近年来高等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成果的基础上,以人文性、审美性和工具性来定位大学语文的价值目标,注重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结合。全书共设计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文学欣赏;第二部分:语言基础;第三部分:现代写作。第一部分具体细分为:古代诗歌(概述、诗经、楚辞、魏晋南北朝诗歌、唐代诗歌、宋代诗歌、元明清诗歌)、古代散文(概述、先秦散文、秦汉散文、唐代散文、宋代散文、明代散文、清代散文)、古代小说(概况、儒林外史、红楼梦)、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现当代诗歌、现当代小说、现当代散文、现当代戏剧)。第二部分具体细分为中国古代汉语(汉字、音韵、词汇、实词、虚词、句式)和中国现代汉语(语法、语法学、语法单位)。第三部分具体细分为文学写作和应用写作(国家行政机关公文、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日常非规范性公文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语言文学基本教程/王文宏主编.--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635-2717-5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大学语文课—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9014 号

书 名: 大学生语言文学基本教程

著作责任者: 王文宏 主编

责任编辑: 王丹丹

出版发行: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0 号(邮编:100876)

发行部: 电话:010-62282185 传真:010-62283578

E-mail: publish@bupt.edu.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97 千字

印 数: 1—4 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35-2717-5

定 价: 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编 委 会

主 编：王文宏

执行主编：梁 刚 薛桂艳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柳 王文宏 王晓坤 刘胜枝

姜 燕 高纪春 梁 刚 黄传武

薛桂艳



第一部分 文学鉴赏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	2
第一节 诗歌	2
第二节 散文	40
第三节 小说	113
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	130
第一节 概述	130
第二节 诗歌作品赏析	140
第三节 散文作品赏析	150
第四节 小说作品赏析	173
第五节 戏剧作品赏析	181

第二部分 语言基础

第三章 古代汉语	188
第一节 汉字的结构	188
第二节 古书中的用字	192
第三节 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196
第四节 古今词义的异同	197
第五节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	200

第六节 古代汉语特殊句式	202
第四章 现代汉语	206
第一节 语音	206
第二节 词汇	208
第三节 语法	212
第四节 修辞	218

第三部分 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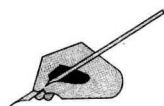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文学写作	226
第一节 文学写作及其意义	226
第二节 作者	229
第三节 文学写作状况与过程	235
第六章 应用写作	240
第一节 应用文概述	240
第二节 公文概述	241
第三节 国家机关行政公文写作	248
第四节 常用行政公文写作	265
第五节 经济类应用文写作	277
第六节 礼仪类应用文写作	288
第七节 日常应用文写作	293
参考文献	310

第

一

部

分



文学鉴赏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

第一节 诗 歌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以《国风》为代表的《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汉魏六朝时期,乐府诗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诗坛。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在这个黄金时代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大诗人。

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词人,如苏轼、柳永、李清照等。南宋后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创作仍有大量作品传世。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

(一)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况

清代赵翼有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毛泽东诗词中亦有一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两处“风骚”的严格意义是指中国古代诗歌发展长河中的璀璨双璧——《诗经》和《楚辞》。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光辉开端。先秦时期,它一般称为《诗》或《诗三百》。后来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诗》被儒生们作为经

典之一加以传习,于是始有《诗经》之名。《诗经》的创作年代,大约是从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

《诗经》就其原来的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这些诗篇根据音乐的不同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做是正声——典范的音乐。“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朝会乐歌,《小雅》的应用范围则由朝会扩展到贵族社会的各种典礼、宴会。“颂”是周天子及诸侯用于宗庙祭典的舞曲、祭歌与颂歌。

《诗经》在艺术手段上采用了赋、比、兴的手法。一般认为,赋即敷陈其事,直接表达某一事物或人物的言行情志,也可称为直陈法。比就是比拟、比喻,是我国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技巧。兴是起兴,主要通过联想与想象,托物起兴。《诗经》常有比、兴联用之例,兴而比,比而兴,往往是二者互补,相得益彰。《诗经》中所有的歌词本来都是可以演唱的,很多章句具有一唱三叹的特色。由于大量运用了双声、叠韵、重言、叠字、叠句、叠章等技巧,《诗经》中的作品往往节奏分明,音韵铿锵,和谐宛转,富有韵律美。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五言、七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总的来看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样式了。四言格式反而在颂、赞、诔、箴、铭等特殊韵文文体中继续延续着生命力。

《楚辞》构成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又一源头。《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关于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为重要的是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得以大量保存,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浓厚的浪漫精神与巫文化色彩。

应当看到,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春秋以来,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楚辞》中的许多句子至今还常被人挂在口边,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九歌·司命》)等。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离骚》中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诗用脚下之路,象征人生之路;用寻找前程,象征追寻理想。它表明尽管人生之路十分漫长、崎岖、坎坷,但诗人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不变。

在中国诗歌史上,《楚辞》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光芒。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把楚辞的主要艺术特点精当地概括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用王逸的话说,就是“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方法,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以及许多咏史、咏怀、感遇的诗篇,都是直接、间接受了屈原这种作风的启发。此外,《离骚》、《招魂》所运用的大胆幻想和夸张的手法,对我国浪漫诗歌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刘勰非常推崇楚辞,认为它“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在秦王朝的短暂统一后,又经历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等朝代,前后共八百多年。这个时期的诗歌,比起先秦时期来有许多新变,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为讲述方便,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两汉时代,约四百余年,其标志性成果为五言诗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汉诗的一部分是乐府诗。所谓乐府,最初指官方设置的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又广泛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当时的民歌中也有不少优美的小诗,如著名的《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此诗形象鲜明,回环往复,音韵和谐,文字活泼,内容看似简单,却韵味悠然,这正是民歌的本色。汉乐府以五言和杂言诗为主。五言乐府诗的流行,对文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文人创作五言诗。

汉诗的另一部分是不入乐府的文人诗。这其中公认《古诗十九首》艺术造诣为最高。《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现在一般认为大抵出于东汉末年,然亦非一时一人之作。《古诗十九首》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以及思乡之情,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其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涉江采芙蓉》的主人公采摘芳草想要赠给远方的妻子,他苦苦吟叹:“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何皎皎》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揽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有给游子带来心灵的慰藉,

相反,倒是激荡起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游子思乡作品在《诗经》中有多篇,《诗经》中游子的思念对象固然有他们的妻子,但更多的是父母双亲;《古诗十九首》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交融在一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第二阶段是曹魏、西晋时代,约一百年,其主要标志是文人五言诗趋于昌盛,并确立了它在诗坛的统治地位。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氏父子又皆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他们的大力提倡扶植下,一度衰微的文学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史称“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今存诗20余首。《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曹操的《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它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和统一天下的壮志。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见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曹魏后期文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作家,人们往往把这个时代的文学称为“正始文学”(正始为魏齐王芳的年号)。嵇康更擅长写散文,诗歌成就不及阮籍。阮籍的代表作是五言《咏怀诗》82首。这是一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诗人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苦闷孤寂的情怀和忧生惧祸的心理。阮籍的诗歌继承了风、骚和《古诗十九首》的传统,在艺术上大量地运用比兴、象征、用典等手法来抒情言志,因而形成了隐晦曲折、旨意遥深的艺术风格。钟嵘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阮籍《咏怀诗》的影响不绝如缕,左思的《咏史》、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以及陈子昂的《感遇》和李白的《古风》等,都明显地得到其艺术的沾溉。

司马氏统一中国,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前期太康(晋武帝年号)年间,文人辈出,文学昌盛,文学史上称为太康文学。潘越的《悼亡诗》和左思的《咏史诗》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

第三阶段是东晋、南北朝、隋代,约三百年,其主要成果是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七言诗的初步发展。

在东晋约一百年里,玄言诗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种诗大都成了老庄思想的传声筒,“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直到东晋末年,才出现大诗人陶渊明。陶诗今存125首,其中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五言诗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的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另一类是前人很少创作的田园诗。《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负盛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首诗大约作于陶渊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樊笼”即官场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不过,陶渊明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隐士”一样,啸聚山林、远离人烟,而是“结庐在人境”(《饮酒》之五),在“斗酒聚比邻”的自然生存状态中挥洒真情。《归园田居》(其五)中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化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几句,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卷三评曰:“前者(其四)悲死者,此首念生者,以死者不复还,而生者可共乐也。故耕种而还,濯足才罢,即以斗酒只鸡,招客为长夜饮也。”诗人开荒南野,免不了稼穡扶犁,与农民一样辛勤耕耘。劳作之后他与邻居相聚饮酒,酒酣之时,慨叹光阴易逝,欢乐太短,于是众人通宵欢饮,把酒达旦。这种田家真景,令人悠然神往。在中国诗歌史上,只是在陶渊明笔下,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才第一次被当做重要的审美对象,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或许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

南朝宋代前期,出现了谢灵运、鲍照等著名诗人。他们主要活动在宋文帝元嘉年间,所以被称为“元嘉文学”。谢灵运,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生平爱好游山玩水,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鲍照的名篇《拟行路难》18首,学习民间《行路难》歌曲(已失传),运用七言和杂言样式,写得流转变放。他的七言诗隔句用韵,改变了过去七言诗(如曹丕《燕歌行》)每句用韵的形式,而且常常换韵,加强了七言诗的节奏和变化,增强了表现力。

南朝齐代诗人中,以谢朓最为杰出。李白所谓“中间小谢又清发”中的“小谢”指的正是谢朓。南齐永明(齐武帝年号)年间,文士周顒、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

病”的理论,主张作诗应区别平、上、去、入四声,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弊病。沈约、谢朓、王融等运用这种理论写作的一部分篇章,近世研究者称之为“新体诗”。新体诗是中国格律诗的萌芽,到唐代进一步发展变化,便形成了“近体诗”(律诗和绝句)。

梁、陈两代,诗人众多。自鲍照《拟行路难》之后,诗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写作七言诗。梁代萧衍、萧纲,陈代徐陵、陈后主等都加入了这一潮流,蔚成风气。可以说,在这时期由于不少诗人的努力,七言诗在诗坛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为唐代五言诗、七言诗并驾齐驱奠定了基础。

唐代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文化的交融、科举的兴盛、思想禁锢的大为缓解,都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结下了累累硕果。而诗歌作为当时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巅峰。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的余光返照中,“上官体”失之绮错婉媚,只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少数人能自拔于流俗之外。直到初唐四杰,诗歌境界才有了新的开拓,尽管他们仍未完全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陈子昂略同时的,还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也有一些佳作。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诗体制的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视为使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唐诗经过初唐 100 多年的准备、酝酿与发展,至此达到鼎盛。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历时最短,但成就最大。这一时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等,而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动人心弦的无疑是“诗仙”李白。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乐府诗《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梁甫吟》,歌行体诗《扶风豪士歌》、《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五言绝句《静夜思》、《玉阶怨》,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山中问答》等。

李白的诗歌最集中地体现了泱泱盛唐的时代风貌,其饱满的青春热情、蓬勃的精神活力、积极的理想抱负、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一切都汇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富有朝气的歌吟。以《行路难》为例:“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首诗从语调到气势,都是李白式的,以第一人称的抒怀和议论表达主观感受,突破了传统乐府用赋体叙事的写法。李白的歌行,更是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不仅感情一气直下,而且还以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来显

示其回旋奔放的节奏旋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抒情方式和语言方式，似暴风急雨，骤起骤落，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轰鸣着盛唐之音。

然而好景不长，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沉重地打击了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使唐朝迅速地由繁荣转入衰乱。李白与杜甫是唐诗世界的双子星座，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人民的苦难以及个人的不幸遭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

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作者自长安前往奉先探家，途经唐玄宗与杨贵妃纵情享乐的骊山时忧愤交集：“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嵯峨。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还有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七言、五言古体叙事诗。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再有一类是律诗，在艺术上达到了唐代近体诗的顶峰。杜甫五律甚多，别开生面，寓变化于整齐之中，名篇有《春望》、《旅夜抒怀》等。杜甫的七律则达到100多首，代表作包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秋兴八首》等。杜甫的律诗具有落笔惊人、出神入化的语言技巧。如《秋兴八首》中的一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凝结着鲜明的色彩和浓郁的香气，剔除了一切虚词，达到了最高的浓缩。这就把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演化推向极致，也是对盛唐诗歌艺术集大成的结果。总之，杜甫一方面为盛唐诗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另一方面又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可能的途径。

中唐前期诗歌创作相对来说处于低潮，后期重现繁荣景象。中唐前期的刘长卿和韦应物以山水诗见称，是王维、孟浩然的余绪；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的余绪。中唐后期的两大诗派是新乐府派和韩孟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自觉发扬杜甫的写实精神，写下了大量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的乐府诗，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提出“为

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在《与元九书》中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创作实践方面,以《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为代表。他笔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形象已深入人心,诗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警,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忧”、“愿”来写卖炭老人的心酸境遇,具有强烈的感染效果。白居易和元稹还努力促使诗歌平民化,增加叙事成分、故事情节,并且注重作品音韵的优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便是这一变革的结晶。韩孟诗派与新乐府派几乎同时出现,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他们标榜“陈言务去”,尚古拙,求奇险,艺术上避熟就生,因难见巧,刻意求新,形成奇崛险怪的风格特色。在两大诗派之外,能够独树一帜,成就较突出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李贺等。

晚唐诗是唐诗的夕阳返照时期。诗坛的整体状况是感伤气息浓重,雕琢风气盛行。晚唐前期极负盛名的诗人是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杜牧擅长写咏史诗,有的悲悼感慨、寄寓遥深,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有的则借题发挥、表达识见,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李商隐作有大量政治诗、咏物诗,但还是以爱情诗最能代表其情致缠绵、空灵凄艳、意象朦胧的独特诗风。名篇《锦瑟》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烘托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虚幻感;“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描摹了那种目成心许却难得结合的恋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则更是比喻中寓象征,写尽了诗人的离情别恨、泣血苦恋。晚唐后期还出现了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发扬中唐新乐府派的创作精神,注意反映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但艺术成就不高。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其成就虽不如唐,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宋代诗歌依时间先后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从北宋开国到宋真宗朝的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宋诗基本上沿袭唐风,为“沿袭期”。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为代表的白居易体(简称白体),魏野、林逋为代表的晚唐体和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

宋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同时,连带反对杨亿、刘筠片面追求属对精工、不重内容的唱和诗风,上承宋初王禹偁关心现实的精神,主张大量创作以反映国计民生为传统的古体诗,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时期为“复古期”,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面目,也在此时初步形成。

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宋诗创作形成第一个高峰期。王安石的《明妃曲》、《乌江亭》等诗,就传统题材翻出新意,充分发挥了宋诗长于议论的特点,读后耐人回味。苏轼诗歌创作的总体特色是气象宏阔,笔力雄健,与其文有相通之处。苏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倾向,远继韩愈而近启黄庭坚。他把宋诗推进

到了“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境界。这一宋诗发展阶段可称为“革新期”。

具体说来，王安石的创作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政治诗为主，常借咏史以明志，《明妃曲》是其代表作：“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唐人咏王昭君多骂毛延寿，多写王之顾恋君恩，而此诗却说王之美貌本非画像所能传达，王昭君流落异域的命运未必比终老汉宫更为不幸，都体现了作者在唐诗之外求新求变的精神。而结尾指出王昭君的悲剧乃是古今宫嫔的共同命运，议论之精警突破前人，充分体现了宋诗长于议论的特征。王安石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转向绝句创作，取得了世人公认的艺术成就，名篇有《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等。

苏轼是宋代文学第一人，其诗冠代，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陆游并称“苏陆”。在苏轼的诗歌中，最多也最为人们喜好的是那些通过描绘日常生活经历和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生情怀的作品。如下面两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浥池怀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在这类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能写这样有兴味的哲理诗的人实在不多。

这一“革新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庭坚、陈师道等，都出自苏轼门下，但诗风与苏氏不同。黄庭坚作诗，有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为新”，仍不失宋诗革新期的首创精神。但后来起而效法者以此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影响巨大的“江西诗派”，宋诗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方面颠来倒去的形式主义道路。宋诗发展进入“凝滞期”。

直到南宋之际，陈与义等人由早期江西诗人对杜诗声律的偏爱转向学习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和苍凉沉郁的风格，在诗歌中反映出民族灾难降临之际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宋诗停滞不前的局面才有所改变。南宋前期，抗敌、北伐成为诗歌表现的重大主题，爱国诗的大量涌现，使宋诗在这方面成为超越前代并给后世以莫大

影响的典范。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纷纷从江西诗派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树立起自己的风格。陆游创作力旺盛,今存诗近万首,其中有许多都是自抒报国壮志和忧时深思的作品,著名的如《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一心报国的英雄却壮志难酬,只能空度岁月,诗人个人的遭遇也是民族命运的缩影。陆游在《金错刀行》中发出“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慨叹。这种悲愤忠烈的感情始终在他心灵中激荡,甚至在睡梦中也会“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清末梁启超评价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除了陆游的“从军乐”,杨万里的“诚斋体”和范成大的田园诗,亦能别开生面,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标志着宋诗发展进入“中兴期”。

南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比较重要的诗人。先后活跃在诗坛上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作诗宗贾岛、姚合,重新走上了宋初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虽也写出一些清新可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宋诗已是每况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以血泪凝成的正气歌彪炳青史,宋诗才最后进出了一道亮光。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始于民间,形成于唐而极盛于宋。据《旧唐书》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唐代的民间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它们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写的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崇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的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位置。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出一种真挚深沉的艺术境界。

通过宋代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宋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委婉、曲尽情态: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都是著例。豪放词作以苏轼为典型代表,苏轼的词相比其诗具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往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咏史、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赋予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